

非洲史（二）

孙颖 主编

目 录

非洲古代史（续）	1
非洲基督教文明传播	1
伊斯兰文明在非洲的传播	29
阿拉伯北非伊斯兰教的传播	29
法蒂玛王朝和马格里布	37
阿尤比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	46
马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	54
马格里布三国对峙时期	62
伊斯兰教在苏丹地区传播	70
西苏丹和中苏丹早期的国家	93
马里帝国兴衰史	113
桑海国兴衰史	132

非洲古代史（续）

非洲基督教文明传播

一、基督教在北非的传播

基督教在非洲大陆的传播，始於埃及。

据传说，埃及基督教的奠基者是彼得的弟子马克。这位来自罗马的传教者，在埃及犹太教徒中找到了自己的信徒。犹太居民是在公元前就进入埃及的。公元初年，他们已经散布在昔兰尼加到努比亚之间的埃及广大地区，尤其在亚历山大城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可以大致推测基督教传入埃及的时期，约在公元 1 世纪。公元 2 世纪早期，埃及出现了早期基督教文献，内容主要是反犹太教的。这说明，此时基督教与犹太教之分野已十分鲜明，争论已十分尖锐，基督教在埃及的势力已经相当可观。

公元 180 年，首次出现了关于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会组织的记载。此时亚历山大城的教会是由主教和 12 名长老所领导。公元 189 年，长老们选举了德米特里乌斯为主教。他在位长达 43 年。

从一开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就对基督教抱有警惕与敌视的态度。基督教以它平等、博爱的朴素教义在普通埃及百姓中传播，无疑意味着对统治者与压迫者——罗马人——某种形式的抗议。所以，早在公元 203 年，埃及的神学家克里门特就遭到罗马当局的迫害，逃离亚

历山大城。

对基督教的迫害不久就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行动。公元 250 年，罗马皇帝戴克犹斯全面迫害基督教。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徒死的死、逃的逃。大批教徒在各种威胁之下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公开申明效忠罗马帝国和皇帝。此时，基督教在埃及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城。因而亚历山大基督教会的溃散，就意味着基督教在埃及的严重受挫。

然而，基督教很快便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因为促使埃及人民皈依基督教的社会因素——罗马帝国的压迫——更加残酷了。正是在戴克犹斯时期，罗马帝国已在经历它走向衰败的各种矛盾与危机。罗马人在埃及的统治也同样走向衰微。作为埃及生存命脉的水利工程逐渐废弛。又偏逢自然灾害：尼罗河枯水周期。罗马统治者又加重其赋税，并逮捕、拷打那些逃避赋税的人，甚至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衰落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基督教的势力也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大批埃及百姓不堪赋税繁苛之苦，纷纷逃入荒原，基督教势力也随之深入荒原。公元 257 年，亚历山大城主教迪奥尼西乌斯面临迫害性审判。这一次，从挫折中复苏的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会旗帜鲜明地支持自己的宗教领袖。当迪奥尼西乌斯被放逐到卡夫拉绿洲时，他就乘此良机在当地居民中进行传教活动。戴克犹斯迫害的最终结果，却是基督教在埃及城乡的广泛传播，以及亚历山大城在埃及基督教会中无可争辩的中心地位。

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基督教遇到了一次空前的大迫害。为了克服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危机，戴克里先进行了改革。他将埃及划为三个省，每省派军事长官实行严

厉统治，并增加军队与驻防军的人数。这样就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与此同时，加紧迫害基督教。对那些坚持自己信仰、拒不屈服的基督徒，动辄处死。公元 311 年，甚至处死了亚历山大城主教彼得。不过，这一次迫害尽管严厉，埃及的基督教会却没有溃散与屈服。许多基督徒宁死不屈，从容就义。以至戴克里先迫害时期又被称为“殉教者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堂在埃及广大农村取代了旧时的神坛。

在罗马人的迫害下，埃及基督徒纷纷逃入荒漠，进行清修，逐渐发展起一种新的、修道院清修形式。中世纪欧洲盛极一时的修道院体制，盖源于此。到了公元 4 世纪时，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南山区，在上埃及的塔本尼西，以及在尼罗河东岸荒原上，都建立了强有力的清修组织。

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皇帝即位。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政策开始从敌视、迫害转变为利用。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亲自在尼卡雅召集宗教大会，讨论教内争辩不休的诸神学问题。埃及长老、神学家阿里乌斯的学说被宣布为“异端”。尼卡雅大会的一个成果，是由宗教法规宣布基督教三大主要的主教辖区：罗马、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承认这三个宗教中心指导其下属主教的权力。其中，亚历山大主教控制了从利比亚边界到努比亚边界大片地区的基督教会事务。亚历山大城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之一。由于亚历山大城是罗马帝国时代对红海印度洋贸易的起点，伴随着贸易活动，基督教也向南阿拉伯与埃塞俄比亚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 4 世纪，阿克苏姆古国采用基督教为国教，并奉亚历山大教长为自己的宗教最高首脑。

公元 379 年，西奥多昔乌斯一世即皇帝位。在他统治下，君士坦丁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跃而成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崛起，对于亚历山大城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与打击。从此，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派（阿拉伯人征服以前，埃及人用希腊字母来拼写埃及语，这就是科普特语，科普特教派以此得名）同拜占庭正教之间不断进行教义之争，即科普特派奉一性论而正教奉两性论。这一斗争终于导致双方分裂。

科普特教派同正教的分裂，表面上看是教义之争，实质上却是由于亚历山大城所代表的埃及不甘受拜占庭帝国政治、经济与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控制。科普特派基督教已是全埃及性的宗教，并控制着从昔兰尼加到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大片地区的宗教事务。尽管如此，东罗马帝国仍然维持着自己在埃及的统治。

公元 619 年，波斯人入侵埃及。次年攻占亚历山大城。在波斯人短暂的征服期间，埃及科普特教会对波斯占领者采取敌视态度，但并不进行积极抗争。公元 639 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641 年占领亚历山大城。广大仇视拜占庭帝国统治的埃及人民和科普特教派，认为拜占庭在埃及统治的瓦解是罗马人罪恶统治的自然结果，因而不仅未对阿拉伯人实行抵抗，反而采取静观与合作态度。

埃及以外受罗马统治的北非地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罗马很深的影响。不过，当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北非当地居民的宗教生活中，尽管罗马诸神也受到祭祀，但当地原住民的宗教仍然根深蒂固。即使是罗马时代北非的浮雕，仍反映着对当地诸神如马库

尔塔、维希纳等的崇奉。特别是远离海滨的内地山区，罗马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基督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的。

关于基督教传入北非地区的时间和路线，目前难以确定。大致说来，基督教可能主要是从埃及经过一些港口，特别是迦太基传入北非的。时间大约在公元 2 世纪。公元 197 年，著名的非洲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已经指出，在罗马北非“基督教徒遍布四野、城堡以及岛屿”，“不同性别、不同年令乃至担任不同职务的人都转到”基督教一边。他在 15 年后又指出，基督教徒“在每一个城镇几乎都占多数”。诚然，作为基督教的辩护人，德尔图良的话完全可能带有宣传的味道，难免夸大其词。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到了公元 3 世纪初，在迦太基举行的宗教领袖会议上，已经有以阿格里平主教为首的 70 名总督领行省与努米底亚的主教参加。在 240 年前后举行的另一次宗教会议有 90 名主教参加。

不过，我们迄今并未能发现早期的基督教堂以及修道院等建筑。这大约是因为，早期北非基督教一般首先在犹太教徒当中活动，吸收教徒，直至利用犹太教堂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本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北非的发掘活动表明，甚至直到公元 3 世纪中叶之前，还无法找到带有鲜明标志或文字的基督教徒的坟墓。因此，对于北非地区早期基督教之影响，也不应有过分的估计。

从传入北非那天起，基督教就带有鲜明的被压迫人民反抗罗马统治的色彩。北非人民从基督教博爱、和平的教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们在热诚地信仰天

堂和上帝的同时，就暗含着对世上统治着他们的罗马帝国的否认。因此，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受到北非地区罗马统治当局的敌视。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 180 年，在西里城就审判了 12 名基督徒。公元 203 年，在总督领行省的土布尔波—米努斯市，又有 6 名基督徒被判投给野兽。其中有一位 22 岁的少妇佩尔佩图亚。她的献身基督教的故事被写进一篇文献流传下来。

罗马当局早期对基督教的迫害，还带有某种自发和分散的性质。被审判的基督徒们的命运，往往还取决于某个总督或市政长官个人的态度和意志。进入公元 3 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危机日益加深，即使是进行改革也无济于事。北非地区柏柏尔居民反抗罗马统治的活动也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从公元 3 世纪中叶开始，罗马人在北非开始推行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政策。

公元 250 年，罗马统治者戴克犹斯宣布敕令，要求臣民摒弃一切其他信仰，特别是放弃基督教。他还强迫帝国所有臣民公开表明自己忠于罗马帝国。在罗马北非，到处掀起捣毁教堂、没收财产、强迫基督徒叛教等活动。这一迫害活动，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又一次加剧起来。在罗马帝国迫害时期，更多的基督徒宁死不屈，成了殉教者。但也有不少教徒被迫叛教。特别是一些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同当局妥协。他们的妥协行为引起广大教徒不满。努米底亚地区的教徒拥立多那图斯为领袖，组成了多那图斯教派，坚持了反对罗马帝国的斗争。

公元 4 世纪初，迫於形势的发展，罗马帝国改变了它对基督教实行迫害的政策，转而承认教会。从此，基督教从一个“抗议的教会”转变成为一个压迫者的教会。罗马帝国在承认基督教的同时，却宣布多那图斯教

派为“非法”。罗马统治当局同教会当局联手，共同残酷迫害多那图斯教派。

公元4世纪中叶，不甘受压迫的北非居民掀起了大规模的阿哥尼斯特运动。罗马当局迅速同基督教非洲教会组织联手镇压起义。这一形势促使阿哥尼斯特运动和多那图斯教派联合。后来，另一次柏柏尔人大起义——费尔姆起义也同多那图斯教派联合。罗马人的镇压，反而促进了多那图斯派的巨大发展。然而，教会当局在对多那图斯教派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雄辩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以他出色的辩才，精彩的神学著作和超人的组织能力为教会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是，奥古斯丁的成就并不能挽救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公元435年，汪达尔人入侵北非，占领了迦太基。在汪达尔人百年统治期间，信奉基督教的另一个教派阿里乌派的学说，对罗马天主教实行迫害。公元533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命贝利萨留率军攻克迦太基。汪达尔人败亡。天主教会又一次抬头，修建教堂，同时迫害阿里乌派、多那图斯派和犹太人。在被压迫人民中又出现了与天主教会対立的聂斯托里教派。而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无休止的辩论，使北非基督教会完全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北非，在摧毁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时，也摧毁了压迫北非人民的基督教。随着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北非地区基督教影响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若干教堂的废墟供人凭吊。

二、东苏丹地区的基督教王国

公元4世纪上半叶，麦罗埃古国败亡了。据推断，

它的统治集团带着大批追随者向西方迁徙，在科尔多凡—达尔富尔一带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但是，在原麦罗埃国家的疆土上、乃至整个东苏丹地区，基本的居民仍在这一地区生活、发展。间或也有若干族群离开和进入这一地区。这一广袤地区的基本生态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古代人民生活方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然而，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使这一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带有了自己特殊的色彩。这种特色，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顽强地闪耀在穆斯林世界西部边缘，长达 8 个世纪，就更加引人注目。

从公元 6 世纪到 14 世纪，在东苏丹地区，史称“基督教努比亚时代”。

根据历史记载，基督教正式传入东苏丹地区，是在 6 世纪中叶。公元 543 年，由拜占庭宫廷派遣了两个彼此对立的传教团：一个受到皇帝查士丁尼支持，另一个受到皇后西奥朵拉支持。结果，皇帝派遣的传教团被西奥朵拉阴谋阻止在上埃及地区，而以朱利安为首的亲皇后的传教团则顺利到达努比亚，在那里受到欢迎。继朱利安之后，西奥多罗斯和郎吉努斯等人又先后前来努比亚传教。其中，郎吉努斯在 578 年应阿勒瓦地区之王邀请，南下该国传教，中途遇到马库里亚国家的敌视，被迫绕道而行，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到达该国，使那儿的国王和百姓都接受了洗礼。

上述这一记载，应被看作是基督教传入东苏丹地区的正式界定年代。不过，基督教开始渗入这一地区的时间，实际上应比这早得多。由于历史的渊源，埃及对东苏丹地区、特别是东苏丹北部地区历来有很大的影响。公元 1 世纪下半叶，埃及地区已经开始基督教化了。此

后，基督教势力自然形成南下渗透的趋势。由于这种小规模、波浪式渗透的结果，到公元 4—5 世纪前后，努比亚北部地区墓葬中的基督教影响已经所在多有。即使在遥远的努比亚南部地区，当郎吉努斯在阿勒瓦传教时，发现那里业已存在一些基督教派的成员。而阿勒瓦地区的基督教影响，显然可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

总之，历史资料表明：在公元 6—7 世纪，东苏丹地区存在着三个基督教国家。自北向南，分布在尼罗河上游一带。大致上说，在尼罗河第一滩至第三滩地区，是诺巴西亚王国，首都法拉斯，其历代国王均葬於距首都不远的巴兰纳；第三滩至第五滩地区，是马库里亚（阿拉伯文称“马库拉”）王国，首都古栋古拉，故而亦称栋古拉王国；第六滩及其以南地区，是阿勒瓦（拉丁文称“阿洛地亚”）王国，以索巴为首都。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国势以马库里亚（即马库拉）最强，诺巴西亚最弱。各自的疆土随彼此国势的消长而消长，并无定界。基督教两大派别，有的在这个国家居优势，有的在那个国家占上风。究其原因，也常有许多偶然性与随意性。因为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东苏丹各国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先天条件，一定要接受哪一个教派的学说。事实上，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准，还远远达不到分辨基督教派别学说之争的程度。大致说来，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们在努比亚地区的影响较大，而拜占庭方面的影响，由于各种因素，相对较小。无论如何，进入 7 世纪以后，文字的和考古的资料均表明，基督教势力已经遍布东苏丹广大地区。除了墓葬之外，基督教教堂是一个极鲜明的标志。位於诺巴西亚首都法拉斯的江门大教堂（Rivergate Church），建於公元 6 世纪中叶，就是东苏

丹早期的基督教建筑。

公元 7 世纪中叶，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伊斯兰教的崛起，阿拉伯人摧枯拉朽式的征伐，使埃及和整个北非穆斯林化，从而基本上切断了东苏丹地区基督教诸王国同外部基督教世界的联系。从此，东苏丹基督教诸国，面临着一个陌生和怀有敌意的外部世界。

公元 641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立即乘势分兵南下，企图一举攻取努比亚地区。然而，由乌格巴·纳菲率领的阿拉伯骑兵，在南征途中遇到努比亚人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据记载，穆斯林士兵遇到箭雨的袭击，大部分人受伤，被迫撤回。应当说，这是处在所向披靡的全盛时期的阿拉伯人所遭到的一次意外挫折。努比亚人自古以善射著称。早在法老时代，埃及人便称其南方的人民为“九弓”之族。因此，受挫的阿拉伯人也说：努比亚人被称为“优秀的射手”。

鉴于进攻失利，又了解到努比亚似乎物产不丰，阿拉伯人遂在 645 年与努比亚人言和。但事隔不久，双方战事又起。据阿拉伯方面记载，责任全在努比亚人一方，努比亚国王夸里德罗特违反和约。阿布德·阿拉赫遂率兵 5000 再次南征，兵临古栋古拉城下，并用弩炮攻城，迫使努比亚人订立城下之盟。

和约自然对努比亚一方带有某种屈辱的色彩。它规定，努比亚人须归还从穆斯林世界逃亡来的奴隶，以及各种穆斯林避难者；须保护努比亚首都的清真寺，不得阻止伊斯兰教信徒前去朝拜，须每年进缴 360 名男女奴隶；关照前来努比亚的穆斯林旅游者，等等。只有不违反和约的上述条款，阿拉伯人才允诺不对努比亚人发动

战争。

尽管带有屈辱色彩，但这一和约的订立，毕竟保证了此后努比亚同穆斯林世界长达数百年的和平。

在上述和约签订后不久，大约在 7 世纪末、8 世纪初，努比亚地区内部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原来在东苏丹地区基督教三国中最弱的诺巴西亚王国，已不复存在。它被合并于马库里亚王国。两国合并的原因与形式，目前尚不清楚。或者是由于北方穆斯林势力的巨大压力迫使努比亚人需要某种形式的联合；或者干脆是强者对弱者的并吞，而外部形势的严峻给这种并吞以某种口实。总之，在 697 年即位的梅库里奥斯国王统治的时代，马库里亚王国已治理着尼罗河第一滩以南的大片疆土。梅库里奥斯在发展努比亚地区的基督教势力当中起过重要作用，因而在埃及基督教徒笔下，他被称为“新的君士坦丁”。梅库里奥斯在原诺巴西亚地区泰发地方建立的教堂，既是马库里亚兼并诺巴西亚的佐证，又是梅库里奥斯发展基督教事业的丰碑。

同阿拉伯人的媾和，使努比亚人取得了和平的外部环境；诺巴西亚的合并於马库里亚，又造成了努比亚地区内部相对的稳定，从此，基督教东苏丹地区进入了它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原来北方的诺巴西亚已沦为马库里亚王国的附庸，它的统治者，现在以副王或总督的身份，保持着某种半独立的状态。至于阿勒瓦王国，由于地处僻远的南方，消息闭塞，也落在史家视线之外。主要是马库里亚王国，独立支撑着东苏丹地区的基督教文明。它所留下的众多文字与考古资料，足以证明它所达到的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

历史资料记载了梅库里奥斯及其以后的国王世系。可以判断，从公元 8 世纪至 13 世纪，马库里亚基督教王国的国势相当强大。在对阿拉伯人的关系上，努比亚人甚至改变了他们的防御态势。745 年，马库里亚国王基里亚科斯甚至干预埃及内部事务，要求埃及统治者释放其扣押的亚历山大教长卡耶尔。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基里亚科斯竟愤而发兵征讨埃及。一说努比亚军竟攻到下埃及的福斯塔特。此后，努比亚军时时袭掠上埃及地区。同时，马库里亚王国十分重视向东方发展。它屡次向东苏丹东部贝贾人地区用兵，意在控制那里的产金区，并同大量渗透进产金区的阿拉伯人势力进行争夺。此外，还可能是企图打通通往红海的商路及出海口。努比亚人在这一方向上的经略，由于对手较弱，因此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公元 1272 年，国王大卫统治时期，占领了红海著名商港埃达布。

随着国势日强，马库里亚君王们自然不甘寂寞，极愿在外部世界崭露头角。8 世纪中叶，马库里亚国王乔治曾先后两次出访巴格达。第一次出访，同巴格达哈里发再次订约，将 651 年和约规定的努比亚每年向阿拉伯人的贡纳，改为三年一次。第二次出访，则更有贝贾王阿里·巴巴陪同（又说是作为俘虏随侍）。乔治的巴格达之行，使东苏丹的马库里亚基督教王国闻名于中东地区，极大地扩大了它的对外影响。鉴于马库里亚王国的强盛，10 世纪末，埃塞俄比亚国王致信努比亚国王乔治，请求努比亚人派主教前往埃塞俄比亚，执掌教权。

在长达数百年的鼎盛发展时期，东苏丹基督教文明在各方面均获得长足的进步。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用古努比亚语书写的各种文

献。在麦罗埃时期之后，东苏丹地区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当地的文献，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现在，努比亚基督教国家又创造了一种有文字的文明，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自明的。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努比亚基督教文明的文献，时间是 795 年。就已获得的此类文献来看，有教堂等建筑物墙上的文字和墓葬与墓碑上的文字，篇幅长短不一；内容有国王、主教、官员的姓名、头衔以及编年资料，有土地所有权、奴隶的所有权，以及宗教祈祷文字，等等。这些文字记载，加上考古发掘的资料，使我们对这一时期东苏丹地区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大致清楚的了解。

在经济方面，努比亚人的社会仍同此前一样，是一个农耕和放牧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从其弓箭制作业的发达，墓葬中弓箭的普遍发现，可以推断，狩猎经济可能是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成分。麦罗埃时期的结束虽标志着发达的冶铁业的衰微，但努比亚人毕竟不会倒退到前金属工具时代，因而社会生产力应有一定水准。从土地、奴隶所有权的文献记载，表明此时私有制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存在。对于外部广大的穆斯林世界，努比亚社会采取半开放的状态。在同阿拉伯人的早期对峙当中，努比亚人仍然同埃及维持着一定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随着缔结和约而加强。最早从穆斯林世界前来努比亚做生意的，应当是埃及的科普特人。他们从埃及运来大量的酒类产品，同时也就运来大量陶制的酒容器。公元 9 世纪初，由于倭马亚王朝的灭亡和继起的阿巴斯王朝对埃及科普特人的宗教迫害，努比亚同埃及酒类贸易剧减。这一情况，客观上刺激了努比亚地区本地制陶业的发展。因而，从 8 世纪下半叶开始，著名的努比亚

基督教时期古典陶器发展起来。基督教时代的努比亚陶器，带有拜占庭与波斯影响的某些痕迹，与埃及和穆斯林世界普遍采用了上釉技艺不同，是一种带有人工画饰的、风格古朴的无釉器皿。此外，由于控制了产金区，也给努比亚社会注入不少的财富。交换手段的丰富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的频繁。努比亚不但不再大量进口埃及的陶器，它的陶器产品反而远销到下埃及的福斯塔特地方，东苏丹濒临红海的科尔·努特山区，以及乍得的科罗·托罗地区。

伴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与进步，努比亚地区人口增加了。许多村庄规模扩大了，居民集中了，如德被拉、厄门纳、麦纳提等村庄，其规模已发展到如同一个小型的市镇。在所有这些大小居民点上，基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如雨后春笋，到处修建起来。到了10世纪下半叶，建筑热在努比亚仍经久不息。1002年在位的国王拉法耶尔，在首都古栋古拉建立新的大教堂，同时仿巴格达风格，用红砖建造了许多建筑物。中世纪的努比亚，是一个社会生活相当稳定、繁荣，教堂林立古朴社会。

马库里亚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基督教王国。国王头衔为卡比尔(Kabil)或卡密尔(Kamil)，是国家的首脑，同时又是宗教领袖，有权主持弥撒仪式。但马库里亚王国政、教并不完全合一。教会在国家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卡拉布沙、克尔塔、卡斯尔·伊布里姆、法拉斯、萨伊和古栋古拉等重要城镇，均设有主教职务。而首都栋古拉的主教，并非由国王任命，而是由亚历山大教长任命。

王位的继承，特别是马库里亚国家晚期，一般是父子承袭制。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传位的制度，

这就是由国王的姊妹之子继承王位。由于这一原因，国王的母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王太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常常享有很高权威。例如，在法拉斯的大教堂壁画中，国王之母曾两次出现。两种继承制度的并存，说明马库里亚国家社会的母系氏族制遗风的强大，以及向完全父系社会转化历程的艰难。同时，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造成国家统治阶级上层的内争与政治上的动荡。例如，在 8 世纪末、9 世纪初，国王乔治一世为了控制贝贾产金区，同那里的阿拉伯人首领乌马里斗争，派遣其姊妹之子纽蒂率军攻打乌马里。纽蒂本是国王的天然继承人，但他却起兵反对国王，迫使国王的一个儿子逃亡阿勒瓦，另一个王子扎卡里亚同他作战，一度大败，仅由两名奴隶陪伴逃过尼罗河；后不惜与穆斯林联手，才打败纽蒂，将他杀死。这一事例，说明了在两种继承制度交替时期，斗争是多么激烈。

国王之下，设有许多高级官吏。其中，最显赫的当属埃帕克。埃帕克意为“马群之主”。他不住在首都栋古拉，而是驻节在法拉斯，后来移驻卡斯尔·伊布里姆。其地位相当於副王。这一职位开始由国王指定，后来事实上成为世袭。埃帕克身穿王服，头戴王冠，地位崇高。很可能是昔日诺巴西亚统治者转化而来。其任务是戍卫国家北部边陲，同北邻埃及打交道，同外来的商人、旅游者（主要是阿拉伯人）打交道。同时控制尼罗河第二滩的关口。埃帕克之外的高官，有掌玺大臣和另一个职权意义不明的“斯特法利斯”。此外，可以看到：一些拜占庭的官衔也被采用。这说明，在原来比较落后的努比亚人社会中，一旦发展起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原有的简单语言、文字即不敷用，因而经常在政治、经济生